

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文丛

第二辑

韩松林

总策划
主 编



朱晓进文学评论选

朱晓进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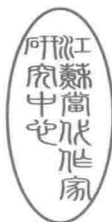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文丛

第二辑

韩松林

总策划
主 编



朱晓进文学评论选

朱晓进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晓进文学评论选 / 朱晓进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9

(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文丛)

ISBN 978-7-5594-0822-8

I. ①朱... II. ①朱...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5583 号

书 名 朱晓进文学评论选

著 者 朱晓进

总 策 划 韩松林

主 编 韩松林

特 约 编 审 张王飞

特 约 编 辑 黄 玲

责 任 编 辑 牟盛洁 王宏波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0822-8

定 价 68.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陈瘦竹文学评论选

陈瘦竹 著
周安华 编



吴奔星文学评论选

吴奔星 著
赵普光 编



叶子铭文学评论选

叶子铭 著
汤淑敏 张光芒 编



许志英文学评论选

许志英 著
王爱松 编



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文丛 第一辑

韩松林 总策划
丁 帆 主 编



曾华鹏文学评论选

曾华鹏 著
张王飞 编



陈辽文学评论选

陈 辽 著
李 静 编



范伯群文学评论选

范伯群 著



董健文学评论选

董 健 著



叶橹文学评论选

叶 橹 著



黄毓璜文学评论选

黄毓璜 著
徐晓华 编



丁帆文学评论选
丁 帆 著



朱晓进文学评论选
朱晓进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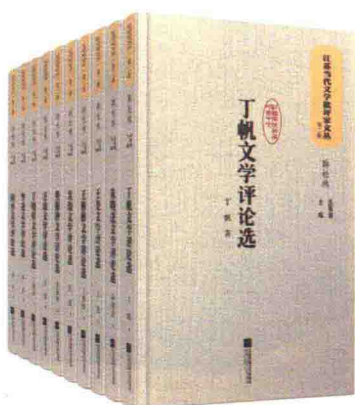
王尧文学评论选
王 尧 著



王彬彬文学评论选
王彬彬 著



吴俊文学评论选
吴 俊 著



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文丛 第二辑

韩松林 总策划
主 编



费振钟文学评论选
费振钟 著



汪政文学评论选
汪 政 著



丁晓原文学评论选
丁晓原 著



季进文学评论选
季 进 著



何平文学评论选
何 平 著

“江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研究丛书

编 委 会

主 任 王燕文

副主任 徐 宁 范小青 韩松林

委 员 丁 帆 王 尧 王彬彬 朱晓进

李敬泽 吴 俊 吴义勤 汪 政

张王飞 张红军 施战军 贾梦玮

阎晶明

总 序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江苏不仅拥有一支强大的文学创作队伍，而且也同时拥有一批占领各个历史阶段文学批评潮头的中坚骨干。创作与评论两支劲旅携手并进，共同成长，双轮互动，比翼齐飞。这种文学景观是共和国文学史上罕见的文学彩虹现象。

为了较为全面地、历时性地呈现江苏当代作家队伍及其丰硕成果，2016年我们推出了包括陈白尘、胡石言、陆文夫、高晓声、张弦、庞瑞垠、赵本夫、储福金、朱苏进、黄蓓佳、范小青、周梅森、叶兆言、韩东、苏童、毕飞宇在内的《江苏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16卷，该套丛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现今，为了展示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的阵容和成就，发扬江苏文学批评传统，加强文学评论建设，在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经专家委员会评审，江苏省作家协会与江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决定联合推出《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文丛》。此次共推出两辑，每辑10人，每人一卷，计20卷。

第一辑收入陈瘦竹、吴奔星、叶子铭、许志英、曾华鹏、陈辽、范伯群、董健、叶橹、黄毓璜10人。这批批评家大多成名于1950年代，并在1980年代进入学术巅峰期。毋庸置疑，他

他们是共和国文学批评界的先驱者和开拓者,他们奠定了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和话语范式,同时参与了当代文学制度和研究领域基本格局的建构。他们在1980年代的厚积薄发,不仅进一步拓展了现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疆域,更是为现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进行反思和转型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和深厚的基础。这一代批评家在批评实践过程中与历史发展保持着极其密切的互动关系,回眸历史,他们的文学批评与文学评论的成就确实构成了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制度乃至当代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文学批评史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第二辑收入了丁帆、朱晓进、王尧、王彬彬、吴俊、费振钟、汪政、丁晓原、季进、何平10人的文学批评文章。在学术师承关系上,这10人所代表的历史代际与前述10人所代表的历史代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血脉联系。他们大多成名于1980年代,经过1990年代的沉潜、反思和转型,如今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和批评界的佼佼者。与前辈学者相比,他们在更为开放、多元的文化与文学思潮背景下接受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学术训练,所以在文学批评学术转型过程中,这批批评家成为先锋和中坚是历史的必然结果。总而言之,他们通过批评实践全面地反思、更新了当代文学批评范式中的主要问题,如概念、对象、方法和理论资源等。同时亦在相关研究中拓展并推进了传统学科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并在跨学科的视界融合中完成了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在价值体系、整体框架等层面的调整、重组和转型,并在文学评论研究领域内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的批判原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1980年代以来的四十余年中,他们以更为学术和学理的姿态,同时亦更为多元、丰富的批评方法与时代

文化思潮进行了全方位的互动。

此套丛书原则上采用了自选集的方式,即每一位入选的批评家自行选择自身批评历程中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入选文章主要是与现当代文学思潮、流派、作家、作品等方面有关的批评和研究。考虑到有的批评家已经去世,或者身体欠佳难以胜任编辑工作,所以,陈瘦竹、吴奔星、叶子铭、曾华鹏、陈辽、黄毓璜 6 人的分卷由编委会指定专人来负责编辑。此套丛书在编辑过程中注重两点:一是原则上按照文章发表先后编排目录;二是保留文章公开发表或出版时的原始面貌。这样的编辑原则,不仅能够较为完整、细致地呈现批评家的成长历程和学术精进的内在轨迹,而且因为收录文章保留了真实的历史信息而具有了史料价值。总而言之,《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文丛》的问世,不仅宏观而细致地彰显了江苏几代批评家的学术成就,展现了他们对现当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坛的学术贡献,而且为还原当代文学的历史现场和推进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史料建设保留了一份非常详实的历史记录。

此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黄小初社长、黄孝阳副总编辑的大力支持,责编汪旭、郝鹏、牟盛洁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江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研究丛书编委会

2017 年 6 月

目录

- 1 总序
- 1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反思
- 21 从政治文化角度研究中国二十世纪文学
- 34 略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政治化传统
——从三十年代文学谈起
- 44 从语言的角度谈中国新诗的评价问题
- 61 五四文学传统与三十年代文学转型
- 89 重读“五四”
- 100 论三十年代文学杂志
- 113 政治文化心理与三十年代文学
- 140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山药蛋派”
——《“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导言
- 152 重新进入“十七年文学”的几点再思考
- 160 政治文化与三十年代作家的文学选择
- 176 论三十年代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特征
——以“左联”的政治文化性质为例
- 190 政治文化语境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批评

204	“新月派”的文学策略
218	“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政治文化意识
230	“远离政治”：一种针对“政治”的姿态 ——论三十年代“京派”等作家群体的政治倾向
244	从地域性特征看“山药蛋派”的历史命运
255	鲁迅艺术活动的文化目的及其与传统文学的关系
283	鲁迅的文体意识及其文体选择
297	三十年代乡土小说的文化意蕴
320	三十年代乡土小说的审美倾向与文体特征
335	在诗海里，这里也有一片帆 ——略论《诗帆》诗歌的成就
344	“山药蛋派”小说创作的“戏剧化”倾向
359	对大跃进民歌的几点再认识
365	细节所蕴含的文化况味 ——小说《所有的》和《家人们》的艺术境界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反思

中国文学史研究作为独立的学科，以及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学术品格的建立，是二十世纪初才开始的。在此之前，中国有文学理论研究，如《文心雕龙》《艺概》《诗品》之类；有文学批评，如诗话、词话、小说评点之类。但唯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研究。从1904年印行的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算起，中国文学史研究至今已有一百年的历史。这百年文学史研究的历史，从学科研究的角度看，到底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启示呢？近年来，人们谈论较多的是文学史观的问题。对于文学史观的关注，这的确体现了当前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上的理论自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曾有过对文学史观的数度强调，而几乎在强调过后也曾产生过对史观问题的疑虑。文学史观作为方法论对文学史研究具有“指南”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渗透在具体的文学史研究中的，是由具体的文学史研究的结果所隐含着或显现着的，如果仅仅将某种史观当作“构造体系”的公式和贴到各种文学现象去的标签，就容易在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时落入“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的套路，而有违“论从史出”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的通行原则。文学史观之与文学史研究的意义是重要的，没有文学史观的统摄，分散的文学现象往往难以凝聚成史。关键是要正确认识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处理好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的关系。

中国人最早为文学作“史”，主要接受了进化论的史观，进化论史观在文学史最初的研究尤其在五四时期占重要地位。胡适《白话文学史》的方法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归纳的理论、历史的眼光和进化的观念。^① 谭正璧的《中国文学史大纲》是我国第一部用白话文编写的由上古叙述到现代的中国文学史著作（1924年泰在图书局初版），其中心史观也是进化论的，他在1929年更是出版了一部《中国文学进化史》（开明书局），在书名上就标明“进化”二字。稍后，郑振铎出版了《中国文学史》（插图本）、《文学大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古卷》等文学史著作。他在介绍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时，基本上是重复胡适的观点，认为只要掌握了“归纳的考察”与“进化的观念”，便如同“执持了一把镰刀，一柄犁把，有了它们，便可以下手去垦种了”^②。

“进化的文学史观念”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比较盛行。^③ 由于进化的文学史观强调文学发展的运动和变迁、发展和进步、联系和规律，应该说就最初的文学史研究而言，进化的文学史观对文学史研究建立自己的学科品格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对进化的文学史观念的过分强调，使文学史研究的目的论色彩过重，文学史研究似乎仅仅为了用来印证事物进化的普遍规律，而文学史研究自身的目的和意义却多少被忽略了。而且，进化的文学史观念本身在方法论上导致的线性思维和决定论思想方法，也给文学史研究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这引起了研究界的不同看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三十年代学界对之的反拨。

①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67页。

② 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国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12页。

③ 关于二十年代文学史研究中的“进化的文学史观”，可参见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中“进化的观念”一节。

明确对这种文学史观提出不同意见的是周作人。他在1932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认为：“中国的文学，在过去所走的并不是一条直路，而是像一道弯曲的河流，从甲处流到乙处，又从乙处流到甲处。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转变。”而这“两种不同的潮流”，周作人是概括为“诗言志——言志派”与“文以载道——载道派”，“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①这种归纳是否准确可以讨论，把“二元”简化成“言志”与“载道”也有简单化之嫌，这难以解释包括“白话文学”在内的文学史现象。其实，完全可以设立多条“二元”线索，例如再设立一些诸如“雅与俗”、“文言与白话”、“文人”与“民间”等的二元线索，也许能够从文学观念到文学形式等多方面的演变中展示文学发展的历史。但周作人这种观点的提出在当时是意在对进化的文学史观的反思和反拨。周作人认为，“五四”以后的学者以“进化论”治文学史，其长处是终于结束了此前对文学的“孤立的、隔离的研究”，以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史的研究”。但同时周作人又指出，以“进化论”研究文学史，其缺点也太明显，这就是易于“空想”出“文学上的一直的方向”，即认为文学是沿一条直线向着某一目标不断进化发展的。周作人还直接点了胡适的名，他说：“胡适之先生在他所著的《白话文学史》中，他以为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唯一的目的地，以前的文学也是朝着这个方向走，只因障碍物太多，直到现在才得走入正轨，而从今以后一定要这样走下去。”周作人明确表示自己“不大赞同”这种“意见”，而坚持认为“中国文学始终是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起伏着，过去如此，将来也总如此”^②。这种重视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内部矛盾运动的观点，起码可以对“进化的文学史观”起

①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岳麓书社（据1934年人文书店重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校订），1989年，第17—18页。

②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岳麓书社（据1934年人文书店重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校订），1989年，第18页。

一种纠偏作用。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既然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的唯一的目的地”，就不能不否定或忽略非白话文学的存在意义和价值，这完全是带着五四时期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倾向的，如此描述出来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其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而周作人强调文学发展史中“互相反对的力量起伏”，情况就很不一样，它没有预设的文学发展目标，各种对立、对峙的文学现象便都能进入文学史家的研究视野，这就在接近文学历史的真实性方面前进了一步。

三十年代像周作人这样对进化论文学史观明确进行质疑的虽不多，但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中直接使用进化论史观的已不多见。与二十年代较多的文学通史相比，三十年代文学史写作，更加趋向于精细化，更注意文学发展的具体性和复杂状态，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也更多了一些断代史、文体史。^①这多少可以表明，人们似乎不再对一条线贯穿到底的文学史写法过于自信，开始关注每一时段文学发展和不同文体体裁文学发展的独特性、丰富性和复杂性。

二

对文学史观的再次强调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基本上是集体编写文学史的时代。从文学史的编写模

① 例如断代文学史著作有：游国恩的《先秦文学》（商务印书馆，1934）、杨荫深的《先秦文学大纲》（中华书局，1932）、罗根泽的《乐府文学史》（北京文化学社，1931）、王礼锡的《南北社会的形态与文学的演变》（神州国光，1931）、苏雪林的《辽金元文学》（商务印书馆，1933）、《唐诗概论》（商务印书馆，1934）、吕思勉的《宋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29）、柯敦伯的《宋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宋云彬的《明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钱基博的《明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4）等；文体史著作有：刘麟生的《中国骈文史》（商务印书馆，1936）、王易的《词曲史》（神州国光，1932）、朱谦之的《中国音乐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5）、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开明书店，1929）、陈中凡的《中国韵文通论》（中华书局，1929）、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1934）、陆侃如的《中国诗史》（大江书铺，1931）、方孝岳的《中国散文概论》（世界书局，1934）、《中国文学批评》（世界书局，1934）等。

式看，基本上采用的是苏联模式。苏联模式的特点是，对文学史观特别强调，即要求以历史唯物主义史观为支撑，在文学史的写作中，强调以人民性或现实主义为线索贯穿全书。早在三十年代，唯物史观就曾一度对文学史的编写产生过影响，罗根泽当年在总结“编文学史的三个时期”时，认为“五四”前为退化史观，“五四”后是进化史观占主导地位，而三十年代则是辩证的唯物史观在起影响作用。^①但三十年代以辩证唯物史观来写文学史，留下的有影响的文学史著作并不多见，这是因为当时对辩证唯物史观的理解还很肤浅，往往只是从几个最基本的概念出发，缺少对唯物主义史观系统而深入的把握，所以成功之作不多。五十年代在文学史研究中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史观，曾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例如，由于唯物史观强调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激发了人们对文学发展规律探究的兴趣，这也使当时的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都特别注重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进程，文学史的“历史”特征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强化；由于强调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文学现象的政治经济等社会的背景受到了充分的关注，这帮助人们从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去认识文学现象的原始起因和最终决定因素，使许多文学现象的存在之由、变迁之故得到了更加合理的解释；由于注重以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作家，可以让人们从阶级和社会学这个特殊的角度去理解社会生活如何通过作家这个特殊中介折射在文学作品中的；由于强调文学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使文学与社会主体以及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得到了特别的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更加凸显出来，这也使得文学史研究对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揭示和阐释给予了特别关注。这些都给文学史研究带来了新的面貌。

但在具体文学史的研究中，由于许多研究者没有从方法论的整体上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只从片面理解的某些历史唯物主义的现成观点去机械地对应所有的文学现象，因而也导致了文学史研究

① 罗根泽：《郑宾于著〈中国文学流变史〉》，《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3—54页。

和写作中的失误。例如，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强调“人民创造历史”，而从表面看，历朝历代的文学作品往往并非直接由“劳动人民”创作的，这就要求研究者对文学创作与“人民创造历史”之间的关系作出合理的解释。在当时文学史的写作中努力找寻文学创作与“人民”的相关性，可以看成是试图作出这种解释的一种努力。在文学发展史中发掘“人民性”成了文学史写作的重要任务。这样，在内容上，那些多少表现了民生疾苦、为下层人民鸣不平、揭露或讽刺了统治者丑行以及批判了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在艺术上，那些由民间创作的，或者多少吸收借鉴了民间艺术养分、多少采用了民间艺术形式或多少与民间文学艺术有点渊源关系的文学作品理所当然地得到了较高的评价。但与此同时，许多虽与上述情况不符但仍具有一定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文学创作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如何使所有的有价值的文学都能进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在当时却是一个没有解决的课题。此外，当时在解释历史上大多数思想意识属于统治阶级而在艺术上又取得了很高成就的作家作品时，认为那是因为作家所遵循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部分地抵消了他们的世界观的反动性等。于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用和意义被提升到了不太恰当的位置，本来是属于文学诸种创作方法之一的“现实主义”成了文学价值的评判标准，忽视了文学创作方法的多样性。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来划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创作类别曾成为文学史写作的通行做法。例如，有人将中国文学发展史仅仅归结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历史。^①这种归结不仅不够全面，而且仅仅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评判的标准，对许多作家作品就难以作出更公正、准确的评价。这样就有许多非现实主义作家作品在这一评判标准之下被摒弃在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视野之外或受到了否定。而有时要肯定某个作家时，就奉送一顶“现实

① 茅盾：《夜读偶记》第二部分“中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夜读偶记》，百花出版社，1958年。